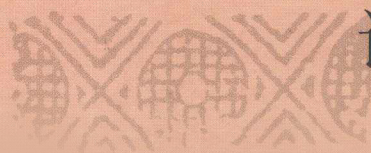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大家讲谭

古代文论 二十三讲

周振甫 著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大家讲谭

古代文论二十三讲

周振甫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古代文论二十三讲 / 周振甫著. —重庆: 重庆大学出版社, 2010.11

(大家讲谭系列)

ISBN 978-7-5624-5767-1

I. ①古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文学理论-中国-古代
IV. ①I0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05689号



古代文论二十三讲 gudai wenlun ershisan jiang
周振甫 著

责任编辑 高雅洁
装帧设计 陆智昌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 邓晓益

社址 (400030) 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 (A区) 内

网址 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635×965 1/16 印张: 20.75 字数: 223千

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24-5767-1 定价: 32.00元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,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 违者必究

编选说明

周振甫先生生前曾对我们说过，他一生做了两件事：当了一辈子的编辑，做了一点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。

周先生做的第一件事是成功的。1987 年中国出版家协会和中华书局在他 80 岁时，曾为他召开了一个“周振甫先生从事编辑工作 50 年大会”，表彰他 50 年来从事编辑工作取得的卓越成绩。出版界的领导和学术界的著名学者出席了大会。几乎从不出席会议的钱锺书先生都到会祝贺并讲了话。钱先生说：“振甫和编辑工作的关系是 50 年，我和振甫的关系是 40 多年。10 年、20 年、30 年、40 年，我们的关系是愈老就愈接近、愈好。”著名学者和书法家启功先生用朱笔画了一幅《松竹图》送给周先生。那一丛挺拔的幽篁，是虚心高洁之美的象征；那一挺铁干虬枝的老松，则是轩昂坚贞之气度的写照。出版界的领导王子野先生，著名学者、资深编辑杨伯峻、刘叶秋等先生还当场题词赋诗：

五十年如一日，甘当无名英雄。

——王子野

生平博览岂辞劳，五十年来千丈毫。

稿件编排随意笔，辞章剖析解牛刀。

谦恭足比陈文象，敦厚真如龙伯高。

今日见闻尤可乐，座中不乏方九皋。

——杨伯峻

一代雕龙手，丹铅五十春。

品缘谦益重，情以朴能真。

发蕴文心古，探幽诗话新。

悠然安斗室，不见画梁尘。

——刘叶秋

中央电视台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、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等众多媒体都作了广泛的报道。为一位编辑召开这样隆重的大会，是没有先例的，在当时曾引起各界人士的注目，而对出版界产生的影响则更大。

1997年，周先生在接受中央电视台《东方之子》采访时，主持人请他谈谈60多年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心得，给年轻一代传授治学之道。周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简单：我没有什么本事，只不过把古代的一些好东西，实事求是地介绍给大家，做了一点普及工作。

周先生说他只做了一点普及工作，其实他做的普及工作，还是不少的。他把影响我国几千年的两部经典著作，《诗经》和《周易》作了译注；他把我国古代最著名的一本文论专著《文心雕龙》作了注释和今译，还主编了《文心雕龙辞典》。在研究《文心雕龙》的基础上，又深入探索古代文论史，写下《中国修辞学史》、《中国文章学史》以及《文论散记》、《文哲散记》、《文论漫笔》等著作。并用“例话”的形式，把深奥枯燥的理论，用生动活泼的例子，作深入浅出的诠释，写下《诗词例话》、《文章例话》、《小说例话》、《风格例话》，构建了中国古典诗文独特的评析系统。其中《诗词例话》自

1962年出版后，风行海内外，累计印数达70多万册。特别在20世纪60年代，专谈写作艺术的书籍还很少，《诗词例话》就成了当时大学文科学生、广大文艺爱好者进入我国古典文艺理论大门的一把钥匙。一本文艺理论的读本，印数竟如此惊人，仅此一例，足以说明周先生做的普及工作是成功的。

关于实事求是，说来话长，应该有专文来谈，这里举几个事例来说说。凡是了解周先生的人，都说周先生做人做学问实事求是，不人云亦云。

例如《诗经·伐檀》中有一句话，“彼君子兮，不素餐兮”，从20世纪50年代起直到现在，中学课本都讲成君子都是白吃饭不干活的，是作为反语讥讽。通行的有权威的中国文学史，也都是这样讲的。周先生引证了大量的史料，认为称白吃的为“尔”，称不白吃的为“彼君子”，认为旧的解释较符合实事求是的要求。（详见《古代诗词三十讲》中的《诗经·伐檀》的分析。）鲁迅在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中，认为嵇康的被杀，表面上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，连累嵇康，实际上因为他说了：“非汤武而薄周孔”，影射了司马昭的篡位。周先生写了《嵇康为什么被杀》，对此事详加考证，认为嵇康被杀，不是“非汤武而薄周孔”，主要是吕安给他的信，要推翻司马氏政权，跟钟会诬陷他要帮助毋丘俭反对司马氏所造成的。

1986年，周先生的《诗文浅释》（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）中收有一篇评析柳宗元《小石潭记》的文章。到1994年，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又出版了周先生另一本《诗文浅说》。周先生在《诗文浅说》的后记中说：

柳宗元的《小石潭记》称“全石以为底，近岸，卷石底以出”，查中华书局本《柳宗元集》是据《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集》标点的，这本子里对“卷石”没有注，再查高步瀛《唐宋文

举要》，对“卷石”也没有注。因此，我把“卷石底以出”解作“潭底石头翻卷过来露出水面”完全错了。原来这个“卷石”的“卷”读 quǎn。“卷石”本于《礼记·中庸》：“今夫山，一卷石之多。”注：“卷犹区也。”《左传》昭公三年：“齐旧器量，豆、区、釜、钟。”注：“四升为豆，四豆为区。”原来“区”是齐国的度量单位，一区等于一斗六升容量，卷石，指相当于一斗六升容量大的石头。在上本书《浅释》里注错了，特向读者道歉。

为一句话，特向读者公开道歉，反映出周先生可贵的实事求是的精神。

再说一件事，就是对毛主席诗词中的两个字，提出修改意见。这件事周先生从来没有说过，连家里的人也不知道。直到逝世前，他才披露这件事。他在《我的编注生涯》（1999）中，是这样淡淡叙述的：“（1956）中国青年出版社向臧克家先生约稿，约他的《毛主席诗词讲解》。臧先生要出版社约人加注。出版社领导就找到我。我看不到毛主席的诗稿，只看到《诗刊》上发表的毛主席的诗词。注到《菩萨蛮·黄鹤楼》的‘把酒酹滔滔’，写信给臧先生，说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‘一樽还酹江月’是以酒奠江月。毛主席酒奠滔滔江水，当作‘酹’，怎么作‘耐’字呢？臧先生同意我的意见，主张用‘酹’字。……等注到《沁园春·雪》：‘山舞银蛇，原驰腊象’，又写信给臧先生说：山盖上雪，用‘银’字来形容。原盖上雪，应用‘蜡’来形容，为什么作‘腊’呢？臧先生同意‘蜡’。……后来他见到毛主席，谈到改‘腊’为‘蜡’，主席也同意了。”在50年代的历史条件下，周先生能对毛主席的诗词提出修改意见，很能说明他做人的正直，做学问的实事求是。

本套书系汇集了周先生有关文论、修辞和诗文鉴赏的文章，编成《〈文心雕龙〉二十二讲》、《怎样学古文二十五讲》、《古代文论二

十三讲》、《古代散文十五讲》、《古代诗词三十讲》、《修辞学九讲》六种读本。本系列中的文章，写于1956年至1999年，如《通俗修辞讲话》写于1956年，其中的用语，特别是例子，是那个时代的产物，为尊重历史，未敢改动，其他的文章，也是如此。由于选编仓促，有不妥之处，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徐名翬

2010年4月于北京

目 录

- 第一讲 中国古代文论略说 /1
- 第二讲 谈我国的古典论文 /12
- 第三讲 谈文气 /24
- 第四讲 谈文笔 /32
- 第五讲 略谈古典文艺论的优点 /58
- 第六讲 春秋笔法 /61
- 第七讲 孟子的文论 /74
- 第八讲 孟子的诗论 /80
- 第九讲 陆机《文赋》的评价 /86
- 第十讲 《世说新语》的文学论 /101
- 第十一讲 刘勰的美学思想 /104
- 第十二讲 中国第一部诗话——《诗品》 /117
- 第十三讲 “文学的自觉时代”的文学论 /120
- 第十四讲 柳宗元的文章论 /132
- 第十五讲 谈柳宗元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 /140
- 第十六讲 谈元好问的诗论 /148
- 第十七讲 论元好问的诗论谈《红楼梦》的作法 /159
- 第十八讲 文学评论家叶燮 /167
- 第十九讲 读章学诚《古文十弊》 /187

第二十讲 谈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中的文论 /201

第二十一讲 林纾的文章论 /206

第二十二讲 章炳麟的文章论 /215

第二十三讲 文论杂说 /228

诗言志 /228

兴观群怨 /234

知言养气 /238

知人论世 /243

以意逆志 /248

言为心声 /252

大象无形 /256

意象 /260

纤徐委备 /265

华巧与适用 /269

万象毕来，献予诗材 /273

系风捕影 /279

文章本天成 /284

记迹传意 /288

尚同求异 /292

三表 /296

唱应不和，悲雅不艳 /301

心之象道 /305

读和写 /311

意在笔先 /312

夹叙夹议和夹喻夹议 /314

第一讲 中国古代文论略说

中国文学源远流长，丰富多彩。有了文学作品，就有研究文学作品的文论出现。我国的文论也是源远流长，丰富多彩的。在这里，想对我国的古代文论，按照文学史的分期作个概述。

先秦文论 先秦时期已有《诗经》和散文，已经产生了儒家和道家的文论。战国时期产生了《楚辞》，对《楚辞》的讨论在西汉已经开始。先秦时儒家的文论，有孔子讲《诗》。在《论语·为政》里，孔子提出“思无邪”来，说明他对诗歌创作，要求思想正确。《论语·阳货》里，孔子说：“诗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”“兴”是启发鼓舞作用，“观”是观察民情风俗的认识作用，“群”是联系群众，“怨”是讽刺。这个论点对后世有不小影响，直到清代王夫之论诗还在讲“兴观群怨”。

接下来孟子在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里讲了“知言养气”。“知言”是懂得各种不正确的言论，探讨它所以造成的原因，这对后来的鉴赏论有影响。“养气”是培养正气，培养正义感。唐代韩愈论文讲“气盛言宜”，就发挥了“养气说”。孟子又在《万章下》讲“知人论世”，要结合作家和他的时代来论他的作品，这在鉴赏上很重要。荀子在《荀子·乐论》里，结合诗和音乐来讨论陶冶性情的教化作用，要去掉淫声和邪僻的文章，回到正路上。以上是儒家的文论。

庄子在《庄子·天道》里讲了轮扁斲轮的故事。轮扁斲轮时觉得轻重快慢都有关系，他在长期劳动中积累了丰富经验，但他说不出来。庄子用这个故事来说明有些精妙的道理是无法言传的。后来的文论借它来说明微妙的情思难以表达，可以同作品有言外之音相结合。庄子在《养生主》里讲庖丁解牛，在牛的骨节间隙处下刀，以免损害刀锋。后来的文论借它来说明必须熟悉各种复杂情况，加以剖析，才能把作品写好。这是道家的文论。

这时期，儒家的文论已涉及创作论、鉴赏论和教化作用。道家的文论以探索创作的体验和精微的构思为主。

两汉文论 两汉文论从讨论《诗经》到《楚辞》、《辞赋》，再涉及其他有关文学问题。

讨论《诗经》的有《毛诗序》，它继承了先秦的“诗言志”说，加上了“情动于衷而形于言”，是情志结合。“情发于声，声成文谓之音”，又把诗和乐结合，归到诗乐的教化作用。又提出“上以风化下，下以风刺上”的美刺作用，要求“发乎情，止乎礼义”。讲诗的表现手法，提出“赋比兴”来，“赋”是直接叙述，“比”是比方，“兴”是借他物引起所说之物。《毛诗序》里讲的情志结合说、美刺说、比兴说，对后来都很有影响。

讨论《楚辞》的有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，传里引了刘安《离骚传》，称赞屈原《离骚》是引古代的人物来讽刺当世。他的创作是即小见大，举近指远。

从《楚辞》发展成汉赋，扬雄在《法言·吾子》里对汉赋提意见：“诗人之赋丽以则，辞人之赋丽以淫。”批评汉大赋追求辞藻而内容空洞。班固《两都赋序》却推汉大赋“与三代同风”。这两种不同的意见，对我们研究汉大赋有帮助。

后汉文论，还推王充的《论衡》，在《艺增》里引《诗》提到

“增”，即夸张。不过他又把夸张说成失实，是不正确的。他在《超奇》里谈到内容和形式问题，称“有根株于下，有荣叶于上”，强调内容的重要性。又称“俗好高古而称所闻”，不满意当时人的尊古，主张贵今。

两汉文论，对《诗经》、《离骚》、《辞赋》都提出了不少新的论点，给魏晋南北朝文论的大发展做了准备工作。

魏晋南北朝文论 魏晋南北朝的文论，探索更深，方面更广，突出的是建立了文学理论体系。

魏代曹丕的《典论·论文》，他提出作家的个性与作家和作品的风格问题、文体问题、文学批评的态度问题、文学价值问题。就个性说，他认为“气之清浊有体”，个性本于气质，难以改变。就文体说，他称“诗赋欲丽”，不谈“诗言志”和赋的“丽则”、“丽淫”，提出了新的看法。

晋代陆机的《文赋》，着重讲创作构思，提出想象作用，突破空间时间的限制。提出情和物的关系，感情从朦胧到鲜明，物象也鲜明地呈现出来。提出结构问题，或由枝到叶，或沿波寻源。在根据内容来确定风格方面，他提出“尚奢”的繁丰，“贵当”的贴切，“言隘”的简约，“唯旷”的旷达。再讲到创作时应该注意的问题，像章节的先后安排、辞理是否恰切、确定全篇的纲要、注意独创等等，作了细致的探讨。

南朝齐梁时代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，是文论的专著，体大思精，超过前人。他建立一个文学理论体系，即“本乎道”，以明道为根本；“体乎经”，按照经书中的特点来创作；“变乎骚”，注意文学的新变，向《离骚》学习。在文体论方面，他分得更细致。他论诗，既提“诗言志”，又称情的“感物吟志”，“持人情性”，即情志结合。论赋，称“睹物兴情，故义必明雅”，提出义的雅正，又分别论述了

诗史和赋史。他在创作论里论作家的风格，从“才、气、学、习”四方面去探讨；论作品的风格，分为“雅与奇反，奥与显殊，繁与约舛，壮与轻乖”，即分八体，构成相反的四对。又提出“风清骨峻，篇体光华”的“风骨”来。他还在《时序》里讲文学史，提出“文变染乎世情，兴废系乎时序”，作为文学演变的规律。他还在《才略》里讲作家论，在《知音》里讲鉴赏论，以创作论最为突出，从创作构思到风格、通变、情采、声律以及各种修辞手法，都作了细致深入的探索，是文学理论中的巨著。

梁代钟嵘的《诗品》专论五言诗，认为五言诗“指事造形，穷情写物，最为详切”。他讲用诗来反映各种生活，有“楚臣去境，汉妾辞宫”，有“负戈外戍”。在五言诗创作上提出“滋味说”，主张“文已尽而意有余”，要有言外之意。他把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，特别推重曹植、陆机、谢灵运，说明他最注重的是文采。

北齐颜之推有《颜氏家训·文章篇》，称：“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，气调为筋骨，事义为皮肤，华丽为冠冕。”强调思想内容，反对浮艳的文风，又主张文章要靠天才。类似这些，刘勰都已讲了。

魏晋南北朝的文论，成就最突出的是刘勰，主要是建立了文学理论体系，创立了创作论、文学史论、鉴赏论。北朝崇尚质朴，在文论上显得贫乏。

唐代文论 唐代文论分诗论、文论两部分。先说诗论，在初唐，梁陈以来浮艳的文风还没有肃清，陈子昂起来纠正这种文弊，在《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》里，指出：“文章道弊五百年矣。汉、魏风骨，晋、宋莫传。”“仆尝暇时观齐、梁间诗，采丽竞繁，而兴寄都绝，每以永叹。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，风雅不作，以耿耿也。”他提出汉魏风骨、风雅兴寄，即有寄托，指《诗经》的美刺，反对齐梁的采丽。这样来纠正齐梁以来浮艳的文风，推重作品的思想感情。

殷璠编唐诗选本《河岳英灵集》，序里称：“文有神来、气来、情来。”他的诗论注意诗的艺术性。皎然《诗式》，提出诗有七德：识理、高古、典丽、风流、精神、质干、体裁。又注意取境，“见奇句”，“观其气貌”，也是注意艺术性。杜甫的《戏为六绝句》，一方面“别裁伪体亲风雅”，“恐与齐梁作后尘”，注意思想感情；一方面“清词丽句必为邻”，“转益多师是汝师”。有取于六朝诗的文采，兼重艺术性。他的诗论比较全面。白居易的《与元九书》，又回到陈子昂的诗论，把梁陈诗称为“嘲风雪，弄花草”，提倡“风雅比兴”，即陈子昂的“风雅兴寄”，主张美刺。他在《新乐府序》里说：“系于意，不系于文”，“其辞质而径”，“其言直而切”，跟他的风雅比兴说一致。他按照这个标准，说李白诗“十无一焉”，杜甫诗“不过三四十首”，未免过于狭隘。

唐代的文论，是中唐时韩愈、柳宗元提倡古文运动，反对六朝讲究对偶、辞藻、声律的骈文，提倡散文。韩愈在《答李翊书》里提出学古文须从道德修养入手，“行之乎仁义之途”，要学习古代散文，“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，非圣人之志不敢存”。创作时，“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，惟陈言之务去”，要说心里话，去陈言，不用古代语，用当代散文去写作。又提倡气势，“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”，即理直气壮，把情感和思想按照语言的节奏恰切地表达出来，破除讲究对偶、声律、辞藻的骈文。他在《答尉迟生书》里说：“本深而末茂，形大而声宏，行峻而言厉，心醇而气和，昭晰者无疑，优游者有余。”内容深厚充实才能写好，根据内容来构成风格，有的激励，有的和顺，有的明晰，有的从容。

柳宗元在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里提出“文者以明道”。要明道，所以在写作时，未敢掉以轻心，怕浮滑；未敢懈怠，怕松弛；未敢昏昏沉沉，怕杂乱；未敢自傲，怕有骄气。要抑制来使文意深入，要宣扬来使文义明白，要疏畅来使文气通达，要谨严来使文辞精练，

要激发它求清新，要凝固它使郑重。根据《书经》来求得质朴，根据《诗经》的抒情来求得永久流传，根据《礼经》来求得适宜，根据《春秋》来求得决断，根据《易经》来取得变化。他就这样来文以明道，在散文创作上取得很大成就。

唐末司空图的诗论，又回到谈艺术上。他在《与王驾评诗书》里，称王维、韦应物“趣味澄复，若清风之出岫”。他在《与李生论诗书》里提出“韵外之致”，即“咸酸之外”的“醇美”，即“味外味”。这些为清代神韵派所推重。

唐代的诗论，有强调兴寄讽喻的，有强调艺术性的，有思想性和艺术性并重的。主张艺术性的一派对后代有深远影响。唐代的文论，在宋代又有了发展。

宋代文论 宋代文论分诗论、文论、词论三者。宋代的诗论，主张纠正晚唐和宋初西昆体的追求辞藻的文风。梅尧臣在《读邵不疑学古诗卷》中提出“作诗无古今，唯造平淡难”，提倡平淡。欧阳修《六一诗话》，称梅诗“又如食橄榄，真味久愈在”。他用朴素的语言“状难写之景，如在目前，含不尽之意，见于言外”。语言平淡，富有韵味。又称苏舜卿诗“笔力豪隽，以超迈横绝为奇”。梅用平淡、苏用豪迈，来纠正偏重浮华的西昆诗风。后来苏轼的诗既有豪迈超逸的一面，又有淡雅高远的一面，他在《书黄子思诗集后》称“韦应物、柳宗元发纤秣于简古，寄至味于淡泊”，在简淡中含有深厚的情味，发展了司空图“味外味”的观点。

稍后黄庭坚《答洪驹父书》称：“古之能为文章者，真能陶冶万物，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，如灵丹一粒，点铁成金也。”要搜集各种词语典故来描绘物象，主张以学问为诗，成了江西诗派的诗论。宋代诗论与唐代不同，唐代讲情韵之美，宋代讲思想的深刻。南宋张戒《岁寒堂诗话》认为诗“坏于苏黄”。“子瞻以议论作诗，鲁直又专

以补缀奇字，学者未得其所长，而先得其所短，诗人之意扫地矣。”他主张诗要“其情真，其味长，其气腾”，“其词婉，其意微”，反对苏诗的议论、黄诗的用奇字典故。到严羽作《沧浪诗话》，在《诗辨》里批评“苏黄”，称他们“以议论为诗，以才学为诗”，“多务使事，不问兴致”。他主张“汉、魏、晋等作与盛唐之诗，则第一义也”。又称“盛唐诗人惟在兴趣，羚羊挂角，无迹可求”。这些论点对后代有影响。

宋代欧阳修继韩愈之后，再次发动古文运动，反对晚唐以来又兴起的骈文。他在《答吴充秀才书》里称：“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。”怎样学道？他反对“弃百事不关心”，要关心百事，体会其中的道理。他在《论尹师鲁墓志》称“通知古今”，“是是非非，务尽其道理”，懂得古今各种事物、是非的道理，才能写好文章。后来苏轼《文说》称：“吾文如万斛泉源，不择地而出，在平地滔滔汨汨，虽一日千里无难。及其与山石曲折，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。所可知者，常行于所当行，常止于不可不止，如是而已矣。”大抵宋代的文论与唐代不同，韩愈讲气势旺盛，偏于刚健，欧阳修讲情韵之美，近于委婉曲折；唐文还有艰深的，宋文力求平易；唐文还有奇特的，宋文力求自然，善于随物赋形，曲折变化，对后代的影响更大。

宋代词论，有李清照《论词》，称“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”，推重南唐李璟、李煜父子与臣子冯延巳的词。对宋词，称柳永“变旧声作新声”，“虽协音律，而词语尘下”，即格调不高。称晏殊、欧阳修、苏轼“学际天人，作为小歌词”，“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，又往往不协音律”。又称词“别是一家”，只有晏几道、贺铸、秦观“始解知之”。她主张词要格调高、浑成、“铺叙”、“典重”，大概是赞美周邦彦一派词。刘辰翁《辛稼轩词序》称辛词“如悲笳万鼓”，“淋漓慷慨”。这样推重辛词，更值得称道。